



---

孫紹振

如是說

孫

紹

振

著

## 孫紹振如是說

本書是孫紹振教授的書評選集，內容兼顧文化、歷史，但主要涉及文學和藝術：從五四時期著名作家的婚姻與戀愛的矛盾，到外國人眼中的中國古典詩歌；從戴望舒為甚麼不是一個浪漫主義者到三毛作品的對話為甚麼沒有水平；從白居易為甚麼不寫唐明皇娶了自己的兒媳，到魯迅為甚麼認為楊玉環與李隆基的愛情早在長生殿已發生危機……均有奇特的議論。作者善於以宏觀的概括，時而作不同民族文化的比較，時而作不同歷史階段的比較，文章以思路開闊、目光深邃見長。作者又善於作微觀的分析，常常輕鬆地從統一的表面揭示出潛在的矛盾和衝突，故其文思不但新異而警策，而且依正反合之辯證思維模式層層深入，從來不作表面現象的平面羅列，故其觀點的層次和轉化井然有序，觀點間有互相依存的體系性。其結構密合，頗具大家風範。

自1989年夏起，孫氏加盟《新晚報》作專欄書評，其犀利而自由的文風深得讀者歡迎。本店精選六十五則匯集成冊，以饗讀者。

HK\$ 55.00

ISBN 962-04-1159-5



9 789620 411595



聯合出版集團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 孫紹振 如是說

---

孫紹振著

責任編輯 舒 非

裝幀設計 洪清淇

- 書 名** 孫紹振如是說
- 著 者** 孫紹振
- 出版發行**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9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 Kong
- 印 刷** 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安業街三號6樓
- 版 次** 1994年5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 規 格** 大32開(140×203mm)256面
- 國際書號** ISBN 962-04-1159-5  
© 1994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 自序

還是在一九八九年夏天，我突然接到香港《新晚報》吳淮青先生的來信，說是請我“加盟”為他們每周寫一篇書評。我寫慣了大文章，一下子不知如何在一千五百字的篇幅中施展。好在淮青曾經是我的學生，他給了我一個簡潔明瞭的提示：文章是理論性的，但要有相當的“感性色彩”。

這以後，我就循着在感性與理性的夾縫中前進的路子，一寫就是四年。這期間包括我一九九〇年在德國特里爾大學和一九九二年在美國南俄勒岡大學的時光。出乎意料的是這些“小塊文章”居然受到香港讀者的喜愛，從編者和讀者那裏不斷傳來溢美的讚詞，使我深受鼓舞。不知從何時起，淮青把書評專欄變成了“孫紹振如是說”。題頭上還畫一個烏紗帽、八字鬚、戴一副眼鏡的書生。起初，淮青把報紙剪下來寄給我的時候，還小心地把這幅小漫畫裁去。也許，他以為這種漫畫會引起我的不悅吧。其實，我從張詩劍先生寄來的剪報上早已看到了，並且十分欣賞那一臉的天真。在西方，給總統、大名流作漫畫肖像乃至漫畫塑像被視為風流韻事，我自然不能貴如總統，但也十分欣賞那老氣而又天真的

戲謔色彩：那烏紗帽掩不住天性的自由和自在，和我是息息相通的。可惜作漫畫的那位先生不認得我，也沒有見過我的照片，因而那幅漫畫和我只限於神似，毫無形似之痕迹。

我寫作這些文章時的心態，正如這幅漫畫的風格所示，是比較自由，同時又是比較認真的。雖然篇幅限制很大，但我力求做到感性理性兼顧。香港讀者甚為忙碌，不可能有太多的時間讀書，因而我的分析都力求有充分的、至少是必要的細節為基礎。這樣，對於已讀過該書的是一種回憶的提示，對於未讀過該書的，也可以就事論事，獲得思考的資料。

至於論述，我比較着重證明和證偽的結合，對於報界流行的那種例證法，即一個觀點加兩個例子的模式，我避之猶恐不及。我年青時受過黑格爾哲學，尤其是他的正反合思維模式的薰陶，成年以後又沉醉於波普爾（Popper）的“證偽說”之中數年，故我從來不滿足於正面論證而力求作正反合證。因而我的觀點常常能層層遞進，螺旋上升。近十年來我又在康德的哲學和價值美學寶庫中獲得啟示，深知審美情感價值與科學及實用價值之不同。在我的美學著作《美的結構》中，我得出了真善美並非等同而是互相錯位的結論。於為文為詩之時，我深感情感的美在邏輯上、價值上必須超越於真和善。而在評析藝術形象時，則相反，我自覺地從超越中還原。我稱這種方法為“還原法”，從感知還原、邏輯還原，直到價值還原。而在還原時，我又習慣於把邏輯

的微觀分析和歷史的宏觀概括相結合。

四年來，我就是把我做學術論文的方法盡可能縮微地運用在一千五百字的短文之中，這本是一種戴着鐐銬的跳舞，可喜的是我越跳越感到自由，越來越能想像出在一顆米粒上雕出幾百字的藝人為什麼感到幸福，願讀者和我分享這種幸福。

孫紹振

一九九三年七月十四日

# 目 錄

自 序	1
-----	---

## 互相瞪着眼睛的中西文化

文化差異猶如聾子對話	3
戴望舒為什麼不是一個浪漫主義者	7
《林家舖子》和奧·亨利	11
徐志摩的詩和現代作家的包辦婚姻	14
女權批評家看蕭紅	18
女作家不是一個性別觀念	22
張潔筆下女主角的國籍	25
外國人筆下張潔的身世	28
女權主義者可否寬宏些	31
在維也納爭論中國朦朧詩	34
關於朦朧詩的一段歷史公案	37
美國人譯中國古典詩諸多局限	40
東西文化在自殺問題上的較量	43
方言文化和政治背景的關係	46
中國古典小說的敘事傳統和海明威	50
在西德讀《女神》匯校本	54



## 台灣文學研究點滴

夏志清的《中國古典小說導論》	59
關於魯迅和張愛玲的評價	65
張愛玲的存在屬一個奇迹	68
張愛玲有獨特的嗅覺	71
大節雖有虧仍應公正評價	74
現代文學的“開山之作”	77
紀弦的形象將因歷史而轉變	81
台灣散文研究的新突破	84
談台灣女詩人席慕蓉的詩	87
龍應台忠於自我無所顧忌	90
拉開了心理距離的藝術	93
內地研究台灣文學的真正開始	96
三毛作品中蹩腳的對話	100

## 大陸文藝風景綫

魯迅研究的兩種病態	105
窺視許廣平的情感生活	108
詩人眼光和小說家眼光的交織	111
丁玲為什麼對沈從文那麼刻薄	114
《圍城》為何未列入“經典”	117
陳思和的《巴金傳》	120
張毓茂筆下的蕭軍	123
王蒙有沒有希望成為詩人	127
莫言的幸運與徐懷中的慧眼	130

張志忠的《莫言論》	133
詩裏的舒婷和散文裏的舒婷	136
劉心武太過一本正經了	139
變化很大的婚姻小說	142
無痛之痛是為至痛	145
談賈平凹的《廢都》	149
《白鹿原》徹底失敗	154
顧城的真正“死因”是什麼？	158
散文當以非詩的追求為上	161
從《伏羲伏羲》到《菊豆》	164

#### 讀書的方法和評書的視角

海峽兩岸的遠距離心理效應	171
系統論思辨仍是個夢	174
解構主義在吃自己的尾巴	177
搭起了一座似夢非夢的橋樑	181
真誠的現代派和虛偽的現代派	184
“圈子內”詩歌評論的代表作	187
讀書和讀注解的關係	190
盲目的權威崇拜不可取	194
文學流派間的批評與武斷	197
關於重寫中國文學史	201
《香港紅學論文選》	204
“冷月葬花魂”和它的論據	207
海明威修改卅九次的結尾的妙處	210

讀《梁思成文集》有感·····	213
人物的感覺和潛感覺·····	216
中國茶文化的光輝與局限·····	219
<b>探索幽默的奧妙</b>	
柏楊和林語堂·····	225
鑽進牛角尖的幽默·····	228
西方美學著作中甚罕見的書籍·····	231
美人出醜和醜人出美·····	234

互相  
瞪着眼睛  
的  
中西文化

---



# 文化差異猶如聾子對話

諾貝爾文學獎先天的西方文化偏狹性，也許並不是有意識的，可能瑞典科學院十八個終身院士很正直，但是這種正直只是一種主觀願望，當他們面對文化和語言隔閡的時候，他們的正直就不能不打折扣。

更何況，就算他們總體上是正直的，但並不能排除，其中個別人有個人偏見，甚至某種交易，有關這種醜聞的報道，既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但是有一屆瑞典科學院的秘書卡爾·大衛·威森否決過托爾斯泰、易卜生、斯特林堡和左拉，倒是比較可信的。

亞洲、非洲作家不可能有歐美作家那樣的便利去和瑞典科學院那些大多年邁的院士接觸，再加上那些院士先生們根本不可能閱讀東方語文。因而就不能不依靠那些並非第一流的，而且又不十分可靠的翻譯，這樣的翻譯不啻又加深了和這些院士先生們的文化心理距離。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瑞典科學院文學委員會在一九八五年增加了一個懂中文的馬悅然先生。但是馬悅然先生孤掌難鳴。他說：“我們的評審委員會共有十八人，可以說，各人都有自己的主張，自己的愛好，所以討論時，非常激烈。要是由我一個人決定，中國作家早就得

獎了。”

對於那些不懂中文又非常自信的十七個委員來說，他們接近中國文學的唯一途徑是英文的譯本，但很可惜，中國現當代作家的作品譯成英文的，既少又差。

第一流作家的英文譯本在西方並不暢銷。奇怪的是，在中國並不怎麼出色的作家，用英文或法文寫作，往往有成功者，不時有獲各種獎的消息或者溢美的評論見諸報端，但是這些作家在中國內地、香港、台灣都沒有什麼影響。

這些人當然不可能成為未來的中國諾貝爾獎獲得者的候選人。

問題在於語言隔閡是如此巨大，按照西方現代的話語理論（discourse）任何一種話語都不但是一種語義的載體，而且是生產語義本身的機制，甚至是一種現實的權力體系的表現。當一種話語翻譯成另一種話語時，意義常常受到歪曲。加利福尼亞大學副教授劉禾就是這方面理論的重要信奉者，她正在研究魯迅的“國民性”問題。她指出“國民性”本來是西方國家走向現代民族國家時出現的一個概念，可是被西方早期到中國來的傳教士用來概括中國老百姓的愚昧落後的種種表現。這與國民性本來的涵意（一個民族的心理認同）有了很大的區別，這種傳教士的書翻成了日文，被魯迅接受了，又用來作為解剖中國民族消極心理的武器，以達到他的啟蒙主義目的。這就與西方傳教士的出發點又有了根本的不同。

正是因為中西語言之不同，在翻譯過程中，中國文學語言的損失簡直如不可控制的水土流失。

根據俄勒岡大學高樂教授和藍丸迪教授的研究，西方人，比如說美國大學生，很難欣賞中國現代文學作品，他們往往首先要求有能夠記得住說得出的人物的主要特點和姓名（中國的姓名他們往往唸不出，記不住）和有關的文化背景，由於不同的文化背景難以理解，因而文學形象難以接受。

因而中國小說常常被認為是沉悶的，或者簡直是不夠高明的，甚至連愛麗絲·渥克（Alice-Walker）那樣對文化差異很敏感的人，在一九八三年讀到魯迅的《阿Q正傳》的英譯本時，竟也認為魯迅“以高高在上，屈尊態度對待他的主人公，就像一些美國南方作家當年對待他們筆下的黑人一樣”，“事實上，他不能相信農民自己能夠理解到他在受壓迫、他自己的生活的。由於故事特別沉悶，我們不知道中國人如何估價它，姑且撇開可能是魯迅第一次在小說描寫農民不談。”

在西方（美國）作家心目中，農民的概念和魯迅心目中的農民完全不是一回事。而翻譯是不可能把這每個“農民”的話語（discourse）的區別提供給讀者的，在Walker看來，一個美國農民居然感覺不到自己在受辱、受迫害，這是不可思議的，而魯迅所強調的恰恰是一種精神麻木或者用胡風的話來說則是“精神奴役創傷”，這二者之間難免有一種聾子的對話的悲劇。

問題在於：對於中國語言中的文化意蘊，諾貝爾獎



金委員會的老先生們可能在某種意義上是聾子，但，也不可能是全聾，也許說他們聽力不佳更確切些，因而中國作家沒有理由絕望，自然也沒有理由性急。